

鲁迅的朋友圈中,有一位特殊友人——瞿秋白。鲁迅是著名作家,瞿秋白是共产党领袖,他们交往的时间并不长,从1932年5月第一次见面,到1935年6月瞿秋白牺牲,相互往来只有三年时间。这三年里,瞿秋白曾经数次去鲁迅家里避难;他们合作编书;瞿秋白甚至借用鲁迅的笔名来发表杂文。
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岂以时间论长短!历史记载的细节,让后人得以循着他们的足迹,重温四川北路两人心灵唱和的吉光片羽。

一见如故

1930年5月—1933年3月,鲁迅先生寓居在北四川路底的拉摩斯公寓(今四川北路2079—2099号北川公寓)A三楼一处居所。这幢公寓由英国人建造,钢筋水泥四层建筑。公寓前梧桐阴翳,公寓后面是多伦路,马路对面转角是内山书店。虽然紧邻日军统治据点,不是很安全,但鲁迅一家在这里安静地生活与工作。

1931年初,瞿秋白因肺病发作,被党中央批准留在上海养病。一位文化巨擘、一位共产党高层领袖,他们似很难有交集。

这年的5月初,党中央机关遭到破坏,瞿秋白在茅盾家避难。适时,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来到茅盾家,送来了左联机关刊物《前哨》。瞿秋白一口气读完《前哨》上鲁迅的文章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》,当读到“我们要十分哀悼和铭记,纪念我们的战死者,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”结语时,瞿秋白不禁拍案叫绝:“写得好,究竟是鲁迅!”他恳切地对茅盾说:“我读过鲁迅先生的很多文章,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,一直无以谋面,始终引为憾事。”

后来,冯雪峰来到鲁迅家,把瞿秋白的情况向鲁迅做了介绍,鲁迅听后也很振奋,他说:“这是个很有才华的青年,他的《莫斯科通讯》,我看过,他翻译的文章耐看。”1931年秋,翻译家、散文家曹靖华从苏联寄给鲁迅《铁流》译稿,鲁迅发现序文没有翻译,感到很遗憾。他立即想起了瞿秋白,便委托冯雪峰请瞿秋白翻译。瞿秋白接到序文后,很快译完。鲁迅读后十分满意,在给曹靖华的信中称赞说:“那译文直到现在为止,是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笔了。”不久,鲁迅又将俄国作家的剧本《解放了的董吉柯德》转交瞿秋白翻译。译完后,先在《北斗》刊载,后又出版单行本。鲁迅则补译《作者传略》,并在《后记》中称赞这篇译文:“注解详明,是一部极可信任的本子。”

1931年9月,鲁迅将日文版《毁灭》转译成中文,并特意让瞿秋白对照俄文本校读。校读完毕后,瞿秋白不揣冒昧,给鲁迅去了一封长信,以“敬爱的同志”相称,他还在信中表达了相见恨晚的感情:“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,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。这种感觉,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,像和对自己说话一样,和自己商量一样。”鲁迅给瞿秋白回信,也以“敬爱的同志”相称。鲁迅和瞿秋白——文字唱和许久,彼此均心灵契合,都急切地盼望着能早日会面。

1932年5月,经冯雪峰引荐,鲁迅在寓所第一次见到了瞿秋白。他们一见如故,倾心而谈,话缘投机,至晚始别,由此开启了一段忘年之交。这以后,鲁迅在日记和函件中,常提到瞿秋白的笔名,如“何凝”“维宁”“维它”“文尹”等,瞿秋白亲切称呼鲁迅为“大先生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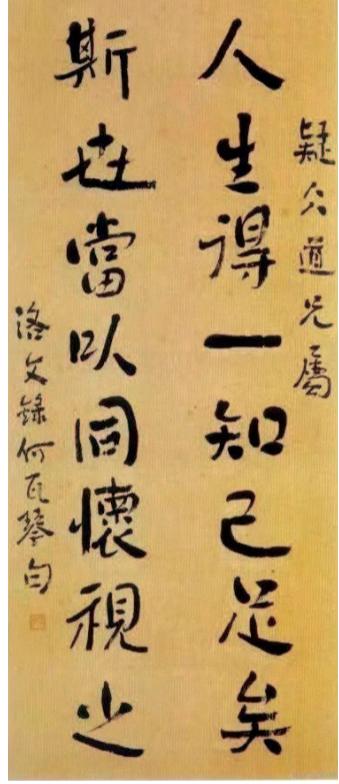
斯世当以同怀视之

李忆庐



■ 鲁迅与瞿秋白(徐悲鸿画)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虹口四川北路的多伦路、山阴路地区,是租界的“越界筑路”地段,成为租界与华界的中间地带。这一地区的特殊地理格局,成为以鲁迅为首的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和文化名人的聚集地。



■ 鲁迅《赠瞿秋白先生联》

▼ 山阴路133弄12号的瞿秋白寓所旧址



后记>>>

瞿秋白到鲁迅寓所避难,以鲁迅的笔名发表杂文,在当时的险恶环境下,是关系到双方人身安全的大事,因而是极其机密的。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,许广平、杨之华等人的回忆,才逐渐披露这段往事。

现在的四川北路底一带,交通便捷,文化气息浓郁。我们漫步其中,追忆那些尘封岁月的往事,对鲁迅、瞿秋白伯牙子期般的真挚情感,倍感追思与温暖。

数次避难

鲁迅寓居在拉摩斯公寓期间,就两次接待了来此避难的瞿秋白夫妇。

1932年11月,瞿秋白所在的紫霞路党中央秘密机关暴露,必须立即转移,深夜实在无处可去,夫妇俩第一个便想到了鲁迅先生。那时,恰巧鲁迅去北平看望生病的母亲,许广平赶紧将主卧让出来,热情地“收容”了他们。鲁迅的处境很艰难,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,日军的一颗炸弹就落在他的窗前。但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,第一回就妥当地将瞿秋白夫妇隐蔽了一个多月。其间,瞿秋白还特意托人买了一盒玩具赠给鲁迅的孩子周海婴,而鲁迅也在日记中郑重记下:“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赠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盒。”

一个多月后的12月23日深夜,陈云受党中央派遣前来鲁迅家,负责转移瞿秋白夫妇。陈云后来在文章中写道,鲁迅将瞿秋白夫妇送至门口,就向秋白同志说:“今晚你平安地到达那里以后,明天叫人告诉我一声,免得我担心。”秋白同志答应了。当他们下了一半楼梯的时候,陈云回头观望,鲁迅和女主人还在门口目送,看鲁迅那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上,表现出非常担心其安全的关切神情。

此后,1933年2月,瞿秋白夫妇再次来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家避难。这次适逢英国大文豪萧伯纳来到上海发表演讲。鲁迅和瞿秋白都想要把这些文章辑录成册,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。他们很快投入工作,先由许广平到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,然后和杨之华共同剪贴,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,鲁迅作序,瞿秋白写卷首语,由野草书屋出版,书名为《萧伯纳在上海》。鲁迅将所得稿费全部资助给瞿秋白。

或许他们总是相聚在突然之间,这让彼此尤为珍惜短暂的相聚。

1933年3月,鲁迅帮忙为瞿秋白租下了北四川路东照里一个日本入住房里的“亭子间”,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住所。3月6日,鲁迅到瞿秋白新居祝贺,并送去了一盆花,以作乔迁之贺,并将清朝文人何瓦琴的联句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,斯世当以同怀视之”书写成条幅相赠。这时,鲁迅已经将瞿秋白视为肝胆相照的知己。瞿秋白搬入新居,也将条幅挂在自己的卧室墙壁上,以示珍爱。

一个月后,鲁迅也从北四川路上的拉摩斯公寓迁居到大陆新村九号。从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走到瞿秋白寓居的东照里,约两百米,两家的往来更为密切。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,和秋白谈论政治、时事、文艺等各方面的事情,乐而忘返。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,两人边说边笑,有时哈哈大笑,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。”

几度合作

在上海养病期间,瞿秋白和杨之华全凭党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生活。瞿秋白是国民政府通缉的共产党要犯,不能在社会上公开谋职业,在当时的上海,这份微薄的经济收入,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。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,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,以稿酬补贴贫困的生活。

作家阿英对此回忆道:“秋白生活很苦,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:《坟场》《莫尔多姑娘》《笑话》《不平常的故事》,想印一本书,换一点稿费。时值合众书局初创,需要买稿,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《二心集》的原稿拿去。书店只为赢利,几天后,先把《二心集》的稿费付了,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。鲁迅知道后很生气,他告诉我,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,否则他的《二心集》要拿走。这样,几经交涉,总算‘开恩’,抽买了一篇《不平常的故事》,稿酬也较高,千字三元。”

当时,瞿秋白是被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领袖,因而,他的名字是不能公开见诸书报刊的,他希望借助鲁迅的笔名发表杂文。鲁迅亦直面淋漓的现实,1933年三四月间,将瞿秋白的杂文以自己的笔名“何家干”发表出来。于是,后人看到《鲁迅全集》《瞿秋白文集》中,有12篇杂文的内容是相同的。

一个黑暗时代,一段传奇佳话。

瞿秋白在与鲁迅“合作”杂文的同时,潜心研读鲁迅的文章,精心编了一部十四五万言的《鲁迅杂感选集》,全书共收录了鲁迅从1918年至1932年的杂文75篇。又花了四天时间,写成一万七千言的长序。这就是署名“何凝”的名篇《鲁迅杂感选集》序言。瞿秋白第一次论述鲁迅“使用的武器便是杂文”,并指出,鲁迅杂文所体现的革命文学传统主要有:最清醒的现实主义,“韧”的战斗,“反自由主义”、反虚伪的精神。这篇序言评价深刻,也获得鲁迅的认同,认为这位晚辈懂得了他,因此也特别敬重这位书生气质的革命者。

虽然出版杂文选集会降低鲁迅杂文单行本的销路,但鲁迅丝毫不以为意,反而很重视这本杂文选集,亲自设计版式,安排插图和校对文字。在刚刚收到良友图书公司版税240元时,鲁迅就将《选集》编辑费200元付给瞿秋白,以帮助他们夫妇渡过生活难关。瞿秋白比鲁迅小18岁,但是共同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让他们引为知己。

引为知己

1934年新年伊始,瞿秋白奉命赴江西瑞金。临行前,他向鲁迅辞行,这是兩人最后一次见面。这天晚上,他们彻夜长谈,鲁迅还将自己的床铺让给瞿秋白,自己在地板上临时搭个睡铺。鲁迅“觉得这样才能使自己稍尽无限友情于万一”。一直到第二天晚上,瞿秋白才返回家中。1935年6月18日,瞿秋白在福建龙岩长汀县英勇就义,年仅36岁。

消息传来,鲁迅悲痛异常。此时的鲁迅已是体弱多病,但他强支病体,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,就搜集了亡友60多万字的译文,并嘱托内山书店将书稿寄到日本,印成两册《海上述林》。鲁迅认为这是

对瞿秋白最好的纪念,他说:“倘其生存,见之当亦高兴,而今竟已归土,哀哉。”出版时署名“诸夏怀霜社”,这其中寓意极深:“诸夏”即中国,“霜”为秋白的原名,诸夏怀霜意为“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”。待到上卷出版后,未等到下卷出版,鲁迅就带着遗憾告别了人世——《海上述林》也是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。

海上述林

卷上:辨林

19· 茹夏怀霜社校印 · 36

■ 《海上述林》上卷封面